

民族学论文选

1951—1983

上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C912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学论文选

1951—1983

上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866

前 言

这套《民族研究论丛》，是从我院教学与科研人员自建校以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研究论文中，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哲学思想和民族古籍研究等门类，选编而成。这样可以积零为整，便于读者参阅，并可回顾我院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历程，以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为了编选这套论丛，在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并由科研处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此次选编的文章仅限于1951年到1983年，1984年以后的文章仍将陆续进行选编。个别学科由于开展研究较迟，发表的文章目前尚不足选编成册，但一俟条件成熟即予选编。有关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今后自当列入本论丛。

编辑这样的论丛在我们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缺乏，水平有限，选编不当，甚至书中出现差错，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276/2

目 录

前言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展望·····	林耀华 (1)
当前我国民族学的特点和任务·····	金天明 杨庆镇 (17)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来源”问题·····	施正一 (30)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陈克进 (46)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	陈永龄 王晓义 (72)
蔡元培和民族学·····	胡起望 (112)
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	吴文藻 (122)
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	吴文藻 王庆仁 (136)
利奇及其新结构主义学说·····	王庆仁 (152)
拉得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	张雪慧 (160)
民俗学的起源、发展和动态·····	杨成志 (171)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费孝通 (181)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	吴泽霖 (196)
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	
制度的初步研究·····	林耀华 陈永龄 宋蜀华
王辅仁集体讨论 宋蜀华执笔 (200)	
试论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封建游牧部落的几个特点	
·····	陈永龄 (229)
青海牧区的工役制度	
——民主改革前青海牧区社会性质探讨之一·····	陈连开 (253)
从云南民族志论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	宋蜀华 (262)
试论解放前我国存在原始公社残余的少数民族地区	
私有制的产生·····	李文潮 (279)
略论种族和种族主义·····	陈凤贤 (291)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 with 展望

林 耀 华

民族学，作为以民族或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门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是广泛而深入的。广在从古至今，只要有人们共同体的存在，就有它的研究科目；纵横全球，只要有民族，就是它的研究内容。深在每一个民族，无论她多么强大还是多么弱小，她的起源、发展、特点、语言、经济、文化……以至于各自的生活习惯，都需要研究。当今世界有两千多个民族存在，只我国就有五十多个民族，而民族的产生渊源可追溯到人类和人类社会出现的时代。由此可知，摆在我们民族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看到以往的成绩，总结我们的研究成果，规划我们的研究任务，培养更多的新人，继续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道路。

—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它走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曾经被全盘否定，彻底扼杀了，但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所作出的成绩，是抹煞不了的。三十年来的工作成绩，雄辩地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学是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的，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民族学。

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早在延安时代对于回族和蒙

古族的历史和社会研究，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民族问题的，如当时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涉及回族的来源、名称、分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现状等等，运用的就是民族学的调查分析方法。虽然在当时还没有称为民族学研究，但实际上做的也就是民族学的工作，这部著作对于确定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指引回族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民族学研究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全国解放后，为了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迫切需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这时，进行民族识别并承认各民族的地位，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经济、文化，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后进的民族得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发展、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与在党的领导下，由各有关学科的工作者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分不开的，这其中，也有民族学工作者的一份劳动。

解放后的头几年中，民族学工作者在民族识别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前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故意抹煞少数民族的存在，加深了民族间的仇恨和隔阂。解放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平等，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有许多过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前不敢提出自己民族的名称，现在才敢公开他们的民族成份，要求作为民族大家庭里的光荣成员。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执行，逐步涌现出很多过去很少听到，甚至没有听到过的族名。在1954年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据说有好几百个，是否这几百个名称都是我国的单一民族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提出民族识别的任务，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而且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

自治权利，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

开展民族识别的科学工作，必须把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关于人们共同体或民族的形成原则和族称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当时除了那些历来被公认的少数民族之外，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提出的大批新的族称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个民族识别工作，是由民族学工作者和其它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和语言学工作者共同协作完成的。语言是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没有语言知识，识别工作就搞不好。比如当时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的彝族人口有三百多万，提出不同的族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共有一百多个，我们通过各单位语言的比较分析，追溯在四省广大的区域内历史上各单位的迁徙变化，他们与其它不同民族交叉杂处，从而各个单位社会经济发展上产生了不平衡性，加上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等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这些不同族称的单位，都是同一个民族，即彝族。结果也得到广大彝族人民的同意，他们希望能以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身份出现。

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国务院在1956年公布了我国共有51个少数民族，后来增加了云南的普米族和西藏的门巴族、珞巴族，最近又增加了云南的基诺族，全国目前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有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确定民族数字，这是我国的创举。全世界有多少个民族？没有人确切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国内有多少民族，苏联学者各有不同的数字。印度也是如此。1956年我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者被邀请参加在苏联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国际上也有许多代表参加，我在会上作的“当前我国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经验，很受赞扬。1979年春天在参加墨西哥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拉美学者和墨西哥学者特别探询我国民族学的研究，对如何识别一个民族、民族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等有关民族识别的

问题极感兴趣。新中国民族学在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上的确做出了成绩，世界各国还没有这样做过，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在理论上提高，毫无疑问会引起世界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实地调查方法，以及利用各种文字史料来研究世界上处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其中重点是实地考察各民族社会经济等情况，加以分析，得出结论。解放以来，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其规模和范围，不但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些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有目共睹，不容抹煞的。其中有关民族学研究方面，积累的材料，做出的成果，是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

1950年—1956年期间，民族学工作者在参加中央派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团或工作队的工作中，在以调查组的名义参加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团体时，都是首先在民族地区摸清基本情况，初步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态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便提供进行民族工作、制订具体民族方针政策的依据。以云南省为例，民族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干部在社会调查研究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方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有22个少数民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特别是内外反动派的长期压迫和剥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民主改革前，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奴隶制或农奴制，因此对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调查，摸清情况是很必要的。由于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查清了各少数民族的族别和人口分布特点，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为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民主改革提供了系统的科学依据。从1955年到1957年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对于处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地

区，采取了“和平协商”方式改革。在废除封建主和奴隶主所有制的前提下，对民族上层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消灭这些阶级及团结、教育、改造其人的方针。对于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少数地区，采取了“直接过渡”方式。由于土地占有不集中，不必再把重分土地作为一个运动阶段，而是在逐步废除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特权的基础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地、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从1950年到1955年这六年的调查研究，直到1957年完成民主改革，云南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一直是走在民族工作的最前面，通过调查研究，摸索民族工作发展的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然后在实践中再加以检验和改进，使我们的民族工作做出了成绩。

1956年，全国科学研究12年规划（草案）制订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更由八个省区，扩展到十六个省区，参加调查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的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任务，参加的人员包括许多学科的研究者，其成果是各学科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晶。

各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积极开展工作，从1959年起陆续写出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统计，整理印出的调查资料190余种，共约1400多万字，整理完毕尚未付印的150余种，1500多万字。这还没有包括调查研究的原始资料，更不消说16个调查组在地方上编印和整理的许多资料了。这些书稿和调查资料，对党的民族工作以及制订在民族地区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的方案，提供了依据或参考。

调查组摄制了十几部还保留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和农奴

制等的少数民族的科学纪录影片。这些影片拍摄的不可多得的现实形象资料，和社会历史调查文字资料，互为补充，可以提供和丰富研究我国各民族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内容。

在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少数民族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一大课题。通过活生生的资料，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解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存在着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总的说来，大约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共有人口三千多万人，保存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这些少数民族大多与汉族接近，而且很多与汉族人民互相杂处，受汉族的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在发展上还是和汉族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在形式上也还保持他们和汉族不相一致的制度和特点。另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解放前或民主改革前，保留着更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还有共约四百万人保存着早期的封建制度，亦即封建农奴制，还有一百万人保存着奴隶制度，以及约有七十万人还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及其浓厚残余。有人说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在解放前后体现出一部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经过十年（1956—1966）的调查研究，看来并不夸张。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得以了解认识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既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也丰富了我们民族学研究的宝库，并使我们的民族学研究队伍，在实践中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国家一向很重视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也很重视民族学研究的人材培养。早在1950年，周总理曾亲自批示立即着手筹建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在省区又建立了九所民族学院。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专门设置了民族学专业，讲授民族学课程，包括民族学基础、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以及有关学

科如人类学、考古学等。为了进一步培养研究人材，还开办了二期民族学研究班。其他省区，如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和地方民族学院也开设了民族学课程或专业。这些民族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分布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已成为民族研究的骨干力量，多年来为党的民族事业做出了很多成绩。

六十年代初期，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辞海》中有关民族问题类的编写修订工作，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两类主要是民族学者的任务。在编订《辞海》的辞目释词以及审查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书稿中，提出了许多难于解决的辞目和问题。当时在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讨论会和座谈会，诸如“民族学”、“民族”、“部族”等词的意义和内容问题，一些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少数民族中若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的讨论座谈会。经过讨论，一些问题解决了，另一些问题仍有争议，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无论如何，这种座谈讨论在当时的确活跃了民族学科领域内的学术空气。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除了以上这些，我国民族学工作者还做了其它工作，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在党的关怀领导下，我们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不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继续前进时，林彪、“四人帮”之流给国家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象其它领域一样，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领域，也遭到严重的摧残、破坏。林彪、“四人帮”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否定民族工作，破坏民族团结，大搞民族分裂，扼杀了民族研究工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民族研究工作停顿了，机构瘫痪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散失了，许多地方的研究队伍解散了，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

失。尤其是他们在民族问题方面制造了许多谬论，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混乱，给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马列主义民族学研究，诬蔑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加以全盘否定，全面扼杀，使“民族学”这门学科在我国被完全取消了，许多民族学研究工作遭受打击摧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幸存下来的研究者们也连“民族学”这个名词都不敢提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提出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其中包括民族学，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民族学的研究，这不仅给民族学恢复了名誉，而且鼓励民族学工作者作出新成绩，我们广大民族学工作者真感到是获得了新生。民族学研究工作开始整顿恢复起来，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我作为一个老民族学工作者，深感到民族学研究有希望、有干头，想和青年人一起好好干一番。

二

要看到民族学的发展前途，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认识。首先，是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民族问题理论属于哲学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而民族学属于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的一门学科。我们要在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民族学的研究，二者并不矛盾。1979年《哲学研究》第5期评论员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中提到的问题，可以使得到启发。文章说：“对于自然现象，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说过这种对自然现象的哲学解释，可以取代各种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当然也是这样”。我体会到这就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代替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大量的、长远的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基本

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研究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学科。文章又说：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广泛的研究工作表明了，他们并没有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取消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专门研究。……又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社会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运用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过社会史，并且下很大苦功去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一部关于原始社会史的著名科学著作。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给社会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工具，但它并不等于社会史这门科学本身，也不能说学会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史中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里说的原始社会史就是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篇文章清楚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包括民族问题理论）和社会科学（包括民族学）的关系和区别，不能把问题混同起来，其实我们经常也是这样想的和做的，只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把理论问题搞得很混乱，象这样的是非重大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罢了。

再有，关于民族学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大家认识不一致，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特别对新生的学科来说。国外研究民族学的年代较长，对民族学的定义和对象，迄今还是争论不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似乎他们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越来越广，急需的研究课题也越来越多了。总的说来，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以及阶级社会所产生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没有其他学科象民族学一样，专以民族为对象的，从这点说民族学是具有独特性质的一门学科，当然有许多学科都在这个或那个侧面研究民族方面的问题，但不象民族学那样把民族作为整体全面来研究。民族学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也同自然科学的

一些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只是有交叉关系而已，这些学科谁都不可能包括谁、代替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民族学是一门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门社会科学。迄今在我国对是否需要民族学这门学科还是有争议的，我看这并不是坏事，有讨论有斗争更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历史上一切新学科的发展都是经过曲折斗争的。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有关记载虽很久远，但它作为一个学科确立毕竟才有一百多年历史，尤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子曾利用它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致使有些人至今不能认识到民族学的真正含义，这是不足为怪的。要紧的是我们广大民族学工作者不能被困难和争论压倒，要大胆探索，敢于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会证明民族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加速发展，也需要民族学研究工作加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学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尤其在当前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更是远远赶不上需要。怎样确立和发展我国的马列主义民族学，使之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摆在我们民族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以下这些，我认为是目前最紧要的。

(1) 以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作我们民族学研究的指针。因为我们的民族学研究，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在目前，特别是为了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的研究，离不开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否则，我们的民族学就不能有别于资产阶级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补充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也为党的民族政策的确

定提供依据。

(2) 继续进行民族识别问题的科学调查研究。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内的实践意义和在国际上引起民族学界的重视前已论及。这项工作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现在除台湾少数民族有待今后调查识别外，还有人口不多的一些族称单位，提出要求成为单一民族。诸如西藏的僜人、夏尔巴人，云南的苦聪人、本人、空格人、山达人、鲜刀人、阿克人、卡老人、八甲人、岔满（自称“克木”）人，四川平武县的达布（今称白马“藏族”）人，川、滇、沪、沽、湖地区的拍味人、纳日人，以及广东海南岛上的临高人等十几个单位，都需要进行识别调查，其中有些目前正在调查研究中。最近获悉，贵州的倮倮（自称“戈摩”）人、穿青人等约有20个族称单位，要求进行民族识别或再识别，据了解当地研究机构正在计划立即进行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少数民族，如四川的嘉戎“藏族”和海南岛的“苗族”等，由于本族人民提出意见，也需要重新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这项工作既要提供科学研究的根据，又要尊重本民族、本单位的意愿，照顾到该民族发展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需要全面考虑，慎重处理。

(3) 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特别是原定要编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的三种社会形态的著作，需要抓紧完成。在现有的调查材料的基础上，配合各地区民族研究机构的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力争系统完整地阐明我国少数民族各种社会类型的面貌。这一研究工作，不仅能够丰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新知识，而且也有助于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对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会起积极重要作用。

(4) 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左右，并有比较丰富的历史记载。但汉族

作为一个民族,有关它的民族起源问题、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等,都还有待讨论研究。五十年代时,我国学术界对汉族的起源问题曾经有过讨论,但后来没有继续进行。此外,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来看,有关汉族的研究还有许多项目至今尚未正式展开,如汉族地区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变化(特别是解放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家庭史、民俗学,以至对海外几千万华人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等等,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每个民族的文化对祖国都有它宝贵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都与劳动群众的创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对汉族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据悉,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内从事俄罗斯民族研究的人数最多,研究的范围也最广。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5) 加强世界民族的研究,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日趋频繁,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重要。民族问题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对于有些国家,不了解他们的民族问题,也就无法了解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说,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情况对我们处理国际事务,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和了解,也是我们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发展的进程,补充我们国内民族研究的不足。国际学术界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国际性会议很多,以前我们都不参加,是一大损失。搞科学研究闭目塞听是不行的,我们应该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扩大我们的眼界。1980年6月间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会成立以来,这方面工作开始做起来了。世界民族很多,要研究的课题也很庞杂,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人力和条件按轻重缓急,逐步展开。

(6) 关于社会主义民族的研究。在我国，习惯上把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人们共同体都统称为民族，这在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人们共同体各个历史类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不同的称呼。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过：“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从这段话里也可以明确得知：人们共同体各个历史类型的发展程序是有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的区别的。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从理论到名词概念的认识都不一致，严重影响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当务之急是关于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怎样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个课题的研究，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7) 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原始社会史作为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对资产阶级伪科学作激烈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虽把原始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但却把原始时代的各族视为“史前”的“野蛮人”，把原始社会看作是“史前史”。我们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分析，确认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民族学工作者需要同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它有关学科的学者一起，广泛地把世界各地各族的材料结合起来，更完备地表述原始社会发展的图景，以阐明人类社会确是按照发展的规律而发展的。所以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它对于分析各族族源问题、社会发展分段问题，以及确定各族社会性质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原始社会史的任务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解放初期经过调查研究，知道还有一些民族保留有浓厚的原始社会制度的残余，我们党根据这一情况制定了直接过渡的方针，使他们超